

第1章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的建立

中国古典大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自19世纪末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试图以欧美大学为蓝本，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变化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时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突变”。西方先进文化随殖民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人文”知识为价值取向的古典大学，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快速转变为以“科学”知识为价值取向的近代大学，进而向现代大学制度过渡。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与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为知识活动的取向与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多元化直接反映到校园规划与校园建筑中，无论从选址、校园形态，还是建筑造型、色彩与材料来看，都不同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不同规划理念与建筑艺术风格在校园中并置、折衷，在碰撞中彼此相互融合。

中国近代大学创立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洋务派”与“维新派”先后进行了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努力。随着洋人枪炮重新进入中国的教会，在获得很多特权后不断兴办教育，希望将西方的宗教、科学与社会观念介绍到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同化中国下一代领导者的目的，将“庚子赔款”以退款办学的形式，投入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中。民国成立后，地方割据势力与各级政府以发展教育作为振兴国家与地区的重要手段，花大力气建设新的大学。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与海外华侨也是近代大学创办的重要力量，他们倾其所有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近代早期，中国传统书院建筑群随着古典高等教育的衰落而停止了发展，新式高等学校校园建设在当时的中国并无成例可循，本土建筑师也没有类似的规划

设计经验，因此我国近代早期大学校园规划多由西方建筑师完成。其中以美国建筑师为主，如墨菲、赫士、凯尔斯等，他们不但将美国校园规划经验介绍到中国，而且在探索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复兴上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吕彦直等本土建筑师在向西方建筑师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杨廷宝、梁思成等年轻才俊学成归来，很多校园规划由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来完成。他们将西方校园规划思想与本土建筑文化结合起来，并将西方教育建筑设计方法介绍到中国。这些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精华的校园建筑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大学校园中一道亮丽的景致。

1.1 洋务兴学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解体，以西方教育体制为蓝本逐渐建立起近代新式教育。晚清思想进步人士，认为封建教育空疏无用，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改革思想上的先导。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选择教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在外来文化强势，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存在严重的矛盾心理。即不愿轻言放弃“正统”思想，又需要西方先进的文化来富国强兵，因此，必然提出一种两面兼顾的做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应运而生。“中学”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先师贤圣立教之旨，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赋税等方面的有效经验，是“应世事”的“外学”。这种“中学”与“西学”的并存与竞争，对于大学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校园建设无不产生极大的影响。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的并存与融合反映到大学校园与建筑建设中，才出现了一些中西建筑并存、不同规划理念相互融合的校园规划。甚至曾出现了像山西大学堂校园中学专斋、西学专斋并存，“大成殿”与西式学堂建筑并存的有趣现象。

1861—1894年，清廷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开展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和学习西方工业化。清政府及洋务派认为“外国之强盛，多赖其船坚炮利；中国之常蒙欺骗，多因不谙西语。”故为了培养洋

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军事与技术人才，洋务运动共创办语言、军事、技术实业类洋务学堂30余所，从教学内容、方法、培养目标上看都明显有别于传统官学、书院、私塾等学校。1862年，洋务派创建了第一所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外国语人才和外交官。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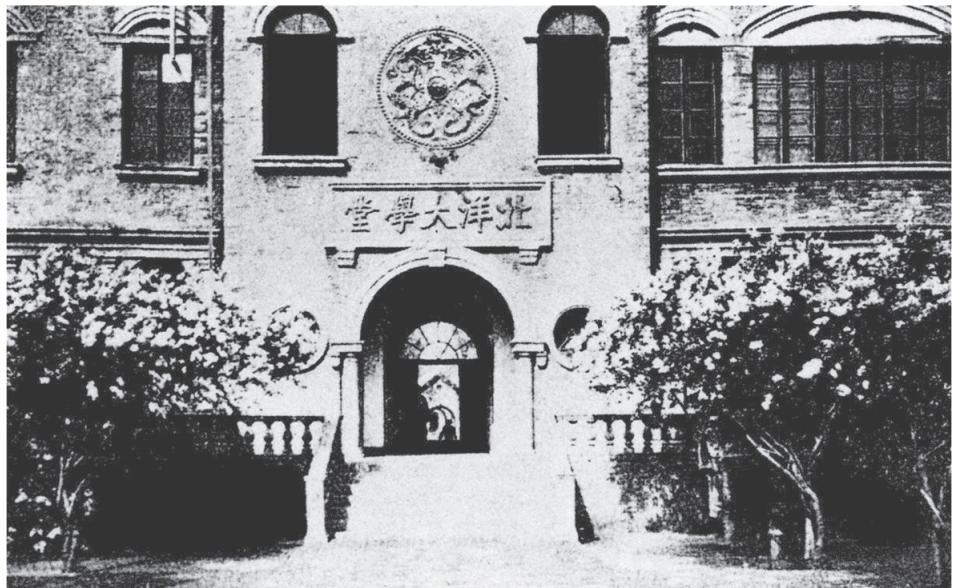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改良维新思想高涨。有识之士认为“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大力呼吁发展新式教育。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于天津创立“北洋西学学堂”，开封建官吏主持下，效法西方模式创办新式“大学”之先河。天津自金、元以来一直是“京畿门户”，近代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与北方的水陆交通枢纽。鸦片战争后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多国在此设有租界，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天津还是“北洋”的中央地带，也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曾开办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正是由于这些优越的条件，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于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天津西学学堂学制完善，经过预科与本科各四年完成培养。其教学内容与方法引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具有进步意义。北洋教学水平很高，头等学堂毕业生不经考试就可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因此北洋西学学堂被视为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式大学。1896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1901年，清政府谕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大学堂”，各地纷纷响应，两年间兴建多所大学堂。但至清末发展稳定的仅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少数几所，成为清末国立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北洋西学学堂最初以原博文书院为校舍，后搬迁到天津西沽武库废墟一带。1903年，校园东端建成教学大楼一座，采用了钟塔、拱廊与柱式的手法，具有明显的西洋古典主义风格（见图1-1（a））。唯其主入口拱门上方装饰的双龙戏珠的图案明示了奉谕建校的背景，不妨也可视为一种中西合璧（见图1-1（b））。北洋大学堂是今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大学百年校庆所建的纪念建筑再现了这一特殊的装饰图案，以昭示校园百年历史的传承。经过多年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北洋工学院（1928年更名）已经建成分区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的校园（见图1-2）。校园发展过程中，保持并继续完善了建校之初存在的东西向轴线，1933年建成南楼（见图1-3（a）），1936年建成北楼（见图1-3（c）），中央围合绿化庭院，形成完整的绿化景观。南楼与北楼的建筑立面均采用红色

清水砖墙，设计强化竖向线条在构图中的作用，南楼设计更富于细节，而北楼设计追求简洁明快。有趣的是，1930年左右建造的校门北侧的办公用房“团城”（见图1-3（b）），却采用了青瓦坡顶、灰色清水墙面的砖木结构平房，外墙上装饰有雉堞。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戏剧性地并置在校园中心区。



(a)



(b)

图1-1 北洋大学堂
(a)教学大楼；(b)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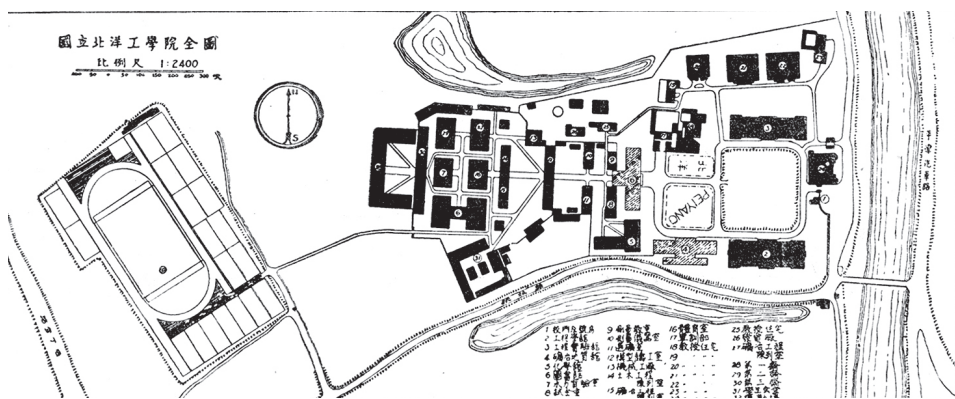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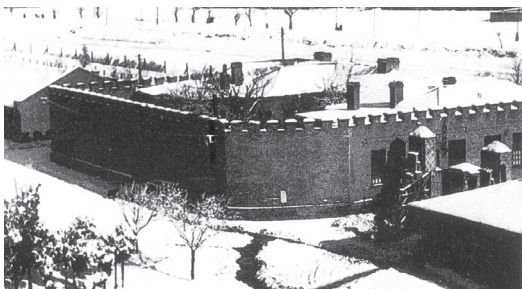


图1-2 北洋工学院1935年平面图



(a)



(b)



(c)

图1-3 北洋工学院内的主要建筑

(a)南楼；(b)团城；(c)北楼

1.2 维新兴学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对日割地赔款，又一次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试图效法明治维新，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图存。维新派认为维新办法，必须从废科举、兴学校做起。1896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明确地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康有为也向光绪帝指出“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总理衙门上奏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并委派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筹备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中央直接创办的大学堂正式成立。作为与旧时中央官学同等级别的最高学府，光绪帝在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时就要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戊戌政变”后，新政基本废止，唯大学堂因其为“培植人才之地”得以幸存，成为维新变法的唯一硕果。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一所类似国子监的教育管理机构，可以管理各省学堂。正是这种领导地位，促使清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校园，以在国内做出表率。虽然由清政府直接筹办，但京师大学堂自成立起，其教学的价值取向就与传统中央官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观其会通，造就通才，发明新理。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分为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程科、商科等分科，形成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1912年，国民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

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校舍布置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硕和嘉公主旧邸（图1-4、图1-5）。1900年，校园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1902年，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学校扩大规模后，现有校舍规模不足以容纳未来学堂的发展。而且，作为朝廷直接开办的大学，如果没有很好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声誉影响很大，无法向世界展示变革与图强的雄心。很多地方学堂的规模都强于京师大学堂，现有校园建筑也无法为地方做出表率。京师大学堂进行了又一次扩建。



图1-4 和硕和嘉公主府改为京师大学堂校舍后内景



图1-5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原公主府梳妆楼)

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划结构基本延续了公主府原有格局，并根据建筑不同功能进行了清晰的功能分区(图1-6)。校园西侧为学生宿舍，从布局的建筑设计都参照了书院建筑。东侧为学校操场，以解决原公主府地块没有体育教学设施的问题。中部区域为教学区，通过不同方向的轴线组织，将旧有建筑和新建建筑有机结合为一体。新的大学堂在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布置出两条平行的南北向轴线。校园正门是原公主府大门，为五间三开大红门。校前区由倒“凹”字形平房围合，形成校园与城市的缓冲空间。北面正中穿堂间连接了一条将教学区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道路。入口轴线自此道路分为两个独立的分轴线，各自具有不同的规划结构与建筑风格。中央道路西侧是原公主府建筑的主轴线，是典型的纵深发展的院落式布局，南侧就是后来作为大讲堂的公主府银

理学院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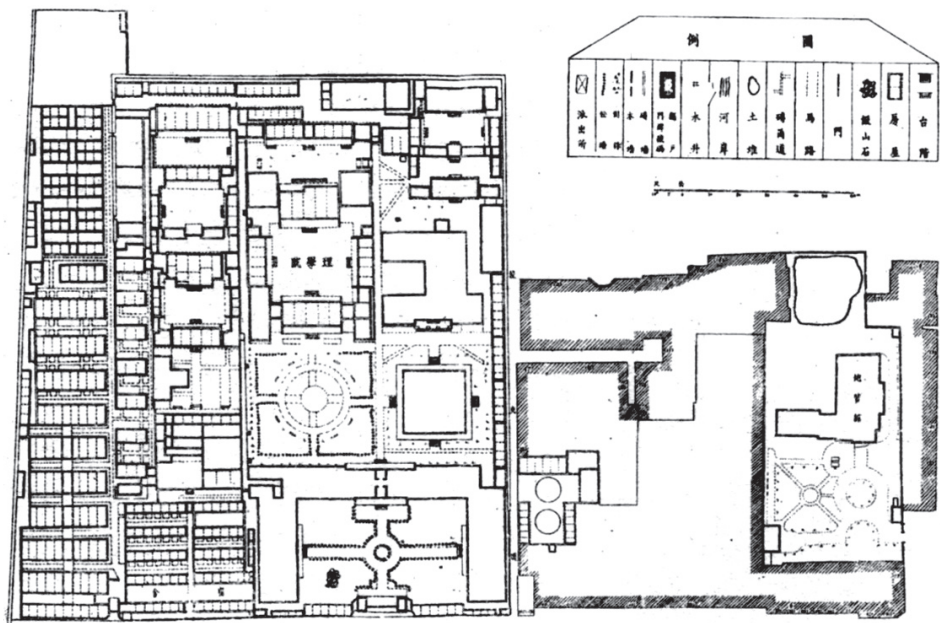


图1-6 京师大学堂总平面图

安殿，轴线的尽端则是由二层的公主梳妆楼改建而成的藏书楼，与中国传统书院讲堂——藏书楼的空间序列关系基本一致。道路东侧新建两栋建筑，南侧是后来的数学楼（南楼）。北侧为一栋平面接近“工”字形的建筑，作为生物馆（北楼），其主体采用了朴实无华西式风格，局部以柱式加以装饰强调。大礼堂前设计了一方形广场，与数学楼形成一东西向次轴线，将两条平行主轴线联结为一体。1923年，李四光先生担任二院庶务主任期间，亲自带领学生对大礼堂前主广场进行了环境设计，在纵横两条轴线的交点建造了荷花池及其上的日晷，点明了空间主题（见图1-7）。总体而言，京师大学堂对于新旧建筑共存的建筑群体规划处理的还是恰当的。考虑到校园新旧建筑结合的特殊情况，这种别出心裁的轴线空间组织很好地结合了基地条件。它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中西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现状，也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办学理念的一种体现。

现存京师大学堂“数学楼”是校园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见图1-8、图1-9）。大概是为了表现变革图强的决心，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采用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被称为“大洋楼”。建筑总高11.45米，每面长27.05米，内

部十字形走廊将平面划分为每层四间方形教室。建筑四周均以拱廊形成外廊，四面等高不等跨的共36个拱，形成了连续的韵律感，后退的内廊在立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影效果。建筑采用灰色清水砖墙，使建筑融入北京城民居的主色调。拱与拱之间装饰有精美的以动、植物为主题的砖雕，二层排水孔设计成为铜钱样式，这些细部处理都给单调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见图1-10）。虽然建筑本身采用洋风，从材料到装饰，中国的元素依然有意识无意识地渗透其中。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上奏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关于高等教育的部分中，规定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三级。并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五目，基本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院和系。1903年6月，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分科又增加经学科。1905年，“学务大臣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到，“查奏，定大学堂章程分列八科，目前骤难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毕业后考升入学。此外



图1-7 大礼堂前广场望数学楼和生物楼



图1-8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



图1-9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立面



图1-10 数学楼拱廊细部

四科，依次建置”，“大学堂规模宜求完备合法……自应照章兴筑，以免临时贻误”。^[1]为设置分科大学，奏折还建议在德胜门外原举行武举会试的演武场择地兴建新的校舍。

甲午战争后，经明治维新而国力日盛的日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维新派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来改造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青年希望赴日学习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盛的方法。而且由于“文字较近，课程较快”，“传习易，经费省，回国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日本逐渐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自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张之洞奉诏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进一步促进了留学的热潮。1905年废科举后，赴日留学达到了高峰，1906年达八千人之多。此时日本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力较美国更大，日本的大学也自然成为京师大学堂首选的建设范本。梁启超最初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曾“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总理衙门奕劻等奏办大学堂工程折》中也提到“臣等奉命承修大学堂工程，业经电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规制广狭、学舍间数，详细绘图贴说，咨送臣衙门参酌办理”。

但由于种种原因，分科大学的建设迟至1908年才开工。此时，预科学生即将毕业，如不加紧建设，校园建筑将不能满足使用要求。1908年7月《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出对德胜门外新校址“详细勘估，圈筑地基，绘具图示，分建各科大学”。并认为建校应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新思想，提出“分科大学现拟开办，兹当图始之时，举凡审定规制，建筑堂舍，厘定学科各事宜，极为繁重，亟应派员出洋考察，以资参政”，并建议派在学堂理事的官员“拟即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其一切建筑设备事宜，亦即详细调查”。最终选定的建筑师是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且由此奏折可见，开始建筑设计应该是1908年7月后开始进行的。真水英夫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6—1902年在文部省任职期间曾赴美考察，在华工作期间著有《天津志》。真水英夫任日本驻华使馆建筑师时，曾主持设计与建造北京日本公使馆新馆，采用了具有明显西洋特征的设计手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设的年代，墨菲、凯尔斯等西方建筑师还没有开始在中国的设计实践中崭露头角，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建筑大家也还未成长起来。而此时正值赴日留学的高峰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庚款办学还未开始，日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正值最高峰。选择熟悉中国的日本建筑师设计京师大学堂的建筑，